



理學叢書

陽明先生集要

上

〔明〕王守仁 原著
〔明〕施邦曜 輯評

中華書局

理學叢書

陽明先生集要 上

〔明〕王守仁原著
〔明〕施邦曜輯評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陽明先生集要/(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輯評;王
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10
(理學叢書)
ISBN 978-7-101-06047-8

I. 陽… II. ①王…②施…③王…④趙…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文集②理學-中國-明代 IV. B248.25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18606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理學叢書

陽明先生集要

(全二冊)

[明]王守仁 原著

[明]施邦曜 輯評

王曉昕 趙平略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3 $\frac{3}{4}$ 印張·4 插頁·70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978-7-101-06047-8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同時，也有以陸九淵爲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主導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雖仍有勢力，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爲以乾嘉樸學爲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了細緻的推究。「牛毛繭絲，無不辨晰」（黃宗羲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作爲民族哲學遺產的一

部分，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對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有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繁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述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點校。

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五月

前言

王曉昕

王陽明(公元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年)，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曾築室故鄉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自南宋理宗欽定程朱理學爲官方指導思想以後，經元至明，朱熹的地位被愈加抬高，其說成爲神聖之教條，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黃宗義語)，成爲學術界普遍之現象。直到明中葉，王陽明以反傳統姿態出現，提出「致良知」說，使理學中的心學一派取得完成的形態，盛行一時，才打破了程朱理學的獨尊局面。一五〇八年，王陽明因獲罪權閥被貶貴州，艱難困苦之中，反鑄成其思想之大悟，史稱「龍場悟道」。「龍場悟道」開創了王陽明批判哲學的起點，也使得幾千年中國思想史的發展在這裏出現了一個新的進境。

一

王陽明一生的學術經歷，有「爲學之變」與「爲教之變」的說法，其中又以「龍場悟道」爲兩者之分野。而龍場之前的求索，又素有「爲學三變」之論，爲學界所普遍認同。其中最具權威性的是黃宗義

明儒學案的「三變」之論，而反映在王陽明全集中年譜的記錄，似乎又有「五變」之事實尚可確認，另外「五溺」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有見於湛甘泉爲陽明所刻之墓銘。於是，陽明的爲學歷程到底是「三變」、「五變」還是「五溺」，成爲如今大可一論的話題。

(一)回顧「三變」說

黃宗羲於明儒學案之卷十姚江學案中關於陽明爲學「三變」的一段話，最爲引人注目：

先生之說，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一）。

梨洲的「三變」之說描述了青年陽明爲學的四個時段，即：一泛濫於詞章、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三出入於佛老、四乃居夷處困，即在龍場。四個時段構成了三次變化。第三次變化即「龍場悟道」，才使其學問「始得其門」。除了黃梨洲的上述說法，還可從陽明的兩位弟子錢德洪和王畿那裏分別找到措辭相似但看法迥異的表述。先看錢德洪刻文錄敘說中所言：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于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二〕。

錢的這一說法與黃梨洲的相比，其同在於：都以「龍場悟道」爲其界限，不同則在於，前者顯然少了一個「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的階段。既然只有三個時段，德洪所言豈不成了「二變」之論？再看王畿在滁陽會語中的說法：

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嘗汨濫于詞章，馳騁于孫、吳，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歎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三〕。

顯然，王畿的這一說法才是真正的「三變說」：一變由汨濫於詞章而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二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而乃始究心於佛老之學；三變則由究心於佛老而至居夷處困後之恍然神悟。此「三變說」與黃梨洲同，可見梨洲之說蓋有鑒於此。至此可以認爲，錢德洪所論，不如王畿與黃梨洲的看法準確。而今人凡舉「三變」之說，通列梨洲、德洪、龍溪而不加區別，更有以德洪爲引徵者，殊不知

龍溪之說才是原創。不管怎樣，「三變論」還是流傳開來了。

(二) 龍場以前已有「四變」

除了「三變」，還有沒有另外的提法呢？王陽明全集中年譜的記述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別樣的視角。下面一段是年譜中關於陽明十八歲時的記述：

二年己酉（孝宗弘治，一四八九年。括弧內爲引者所加。下同），先生十八歲，寓江西。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四〕。

這一年陽明由「詞章之習」進於「始慕聖學」，應視爲其爲學歷程的第一變。明初，幾位稍有名氣的儒學家，根據黃宗羲的看法，「認爲這個時期的主要思想家是吳與弼、薛瑄及陳白沙。不過，這些人對當時哲學思想並無新的貢獻。除白沙以外，其他都是朱熹思想的解釋者」〔五〕包括陽明在廣信拜見的老師婁諒。婁諒是吳與弼的學生，從王陽明思想發展行程看，與婁諒的會面顯然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年譜以「是年先生始慕聖學」爲條頭，顯然具有某種象徵和標誌的意義。作爲少年學生的王陽明在學業上的選擇並無更大餘地，雖然少時已氾濫於詞章，但並非不知作聖之事，故能於孩提之時就

發出「讀書乃作聖賢」的豪言。在陽明的少年時段，「作聖賢」之理想和「契於聖學」之功用是不同時期的事情。先有「作聖賢」之理想，後有「契於聖學」之功用。在功用方面，陽明首選的途徑是詞章之學，但後來他知道，朱熹是把自己的儒學與所謂「記誦」、「辭章」相區別的。「在朱熹看來，以往儒學的發展，講禮、講孝，等等，但什麼是禮、什麼是孝，却並沒有弄得清楚明白。在治國問題上「禮意」和「禮儀」之爭，在盡孝問題上名教與自然之爭，都是沒弄明白的反映。」^{〔六〕}漢代的儒學，在他們看來，只是記誦之學或者章句之學。這樣的學問，就是沒有弄清什麼是禮、什麼是孝。在認識上偏離了孔子的方向，在行動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儒者之道^{〔七〕}。」^{〔八〕}婁諒向陽明介紹朱熹的格物之學，並告之以「聖人必可學而至」的道理，鑄成了陽明由「汜濫於詞章」向「始慕聖學」的最初一變。之後我們看到，陽明年紀很輕的時候，就開始追求儒家之道，並想找出宋儒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格物」一詞的意義。年譜記述了陽明刻苦用功於聖學以求「格物」之深蘊的感人事例。這一年他十九歲：

（一四九〇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習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遊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諠，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惜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九〕}。

但僅僅兩年之後，一樁「格竹求理」的荒唐之舉，使陽明的爲學之途又發生了變化。年譜載：

五年壬子（一四九二年），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九）。

陽明在父親花園中對着竹子凝神靜思，希望發現竹子中所涵本性。因爲這是朱熹所講的方法，朱熹認爲天地萬物皆涵至理，通過對一事一物的「格」，便可發見。可是陽明連「格」七天，却一無所獲，反而病倒了。由此生出對格物之學的懷疑。如果說有什麼收穫，那就是所謂「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於是構成陽明爲學歷程上的第二變。這一次的變化並沒有像王畿和梨洲所說那樣，立馬開始「出入於佛老」，而是又回到了詞章之習的老路上。這一回頭就是六年時間，不可謂短。

從二十一歲到二十七歲這個期間，根據年譜記載，陽明回到了以學習辭章藝能爲主的舊途，這一點表明了一個青年學子通常的徘徊不定。他也曾希望從學子之業而一伸經國濟民之志。他赴鄉試落第，尚能以「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以自安。不過終於進士及第，並授命工部主事，也曾對邊事饒有興趣，以至於幾番上書朝廷加以討論。

到二十七歲這一年，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年譜記載：

十一年戊午（一四九八年），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靜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兩次對朱子學說的懷疑，導致了陽明兩次變化。一次是二十一歲時「格竹之舉」的失敗，一次是二十七歲時讀朱子上宋光宗疏導致的迷茫。不知是不是巧合，陽明的這兩次懷疑，恰好印證了對朱熹關於「格物致知」的二重解讀的反思，這爲以後新思想的誕生埋下了伏筆。朱熹對「格物致知」有一套專門的解讀，後爲世儒所宗，其中關於「格物」的途徑朱熹主要講了兩條：一是通過讀書以明義理；二是灑掃應對之接人待物。陽明正是老老實實照着這兩條去做而產生迷惑的。照着「接物」一條而去格竹，照着「讀書」一條而去「居敬」、「循序」，其結果均產生出「物理吾心終判而爲二」的感受，更是「益委聖賢有分」，又恰逢有道士談養生，便產生了「遺世入山」的想法。陽明二十七歲的這次變化，構成其爲學歷程上的第三次變化。

從二十七到三十一歲這個期間，陽明的主要興趣大概在佛教和道教。陽明一生與道釋二家的聯繫及影響，截止龍場之前，年譜的記錄至少有如下幾個要點：

其一，成化十二年，陽明五歲，還不會開口說話，「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

其二，弘治元年，陽明十七歲，七月在洪都娶諸氏爲妻，「合卺之日，偶閑行人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

其三，弘治十一年，陽明二十七歲，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其四，弘治十四年，陽明三十歲。遊九華山，「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岩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旁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其五，弘治十五年，陽明三十一歲。「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第二年，陽明因養病來到杭州西湖，來往於南屏、虎跑等寺廟，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什麼！終日眼睜睜看什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喻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佛家特別是禪宗，對宋明儒家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雖然程朱學派非常反對禪宗，但宋以後的學者很少不與禪者與佛書接觸。王陽明自不例外，而更有甚者，陽明之後的空談心性之風，無不與此

相關。

陽明三十一歲之後，開始了他爲學歷程上的又一次徘徊，這次徘徊是從對佛、道二家的懷疑開始的：

十有五年壬戌（一五〇二年），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

直到弘治十八年，經過了長達三、四年的懷疑和探索，也可以說是陽明思想經歷了由氾濫各家到歸本聖學的轉化期，因結識湛甘泉而導致了其爲學歷程上截止龍場之前的第四變：

十有八年乙丑（一五〇五年），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于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〇〇）。

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談談湛甘泉，以及湛甘泉與王陽明之間的一些聯繫。

(三)析甘泉「五溺」說

「五溺」之說見於湛甘泉爲陽明所作墓銘：

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於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二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于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指^(一)。

湛若水之前的明儒，無論是程朱理學的信從者還是陸九淵心學的追隨者，沒有人想太平盛世不去入仕而甘居隱修以作聖人的。若水的老師陳獻章反其道而行之，是一個爲世人所贊許的「真儒」。他執意遠離官場，獨創了一套做聖人的靜坐修身方法。陳獻章的言行還影響了一大批學人，這些人不再從事治國平天下之類的聖賢之學，而把隱居靜修、成聖成賢作爲自己努力的目標。湛若水甘泉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湛若水提出的宗旨乃是「隨處體認天理」。他發展並突破了他老師那套靜坐的方法，要求隨處尤其在自己心中體認天理，這就離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僅有一步之遙了。

從年譜多處記述可以看出陳獻章與湛甘泉對陽明產生影響。黃梨洲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

者亦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白沙）而始明，至文成（陽明）而始大。（明儒學案卷五）再說甘泉的「五溺之說」，有兩點是應特別指出的：其一，任俠之習和騎射之習，說來均不能列入學術範疇，神仙之習與佛氏之習也只是上述多家所稱之「出入於佛老」一事。無論從年譜還是其他種種材料來看，陽明所涉佛、道二家均或同時或交叉，其中並無幡改。這樣一來，所謂「五溺」所涉為學，就只有了兩變可立。其二，甘泉把時間提前了兩年，自然就沒有把「龍場悟道」包涵進來，其凸現「丙寅定交」之目的則是顯而易見的。如此說來，從「詞章之習」到「出入於佛老」為第一變，再到「丙寅定交」為第二變，再加上「龍場悟道」，甘泉的論說仍為「三變之論」。

還可以看到陽明本人是如何說的。朱子晚年定論序云：

守仁早歲業舉，溺于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越，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

此陽明自述其為學所經之階段。從「溺于詞章之習」到「稍知從事正學」，是為第一變也。其中「稍知」二字甚為精當，刻劃出陽明於聖學認識的初級程度。無疑，這是符合一個十八歲青年的認識

水準的。陽明選擇朱子學，按當時的學術氣氛，理所必然，而格竹受挫的原因則在於年輕的陽明不知感性認識不足以達到事物之本質這個道理。

既是「稍知」，則往往面對各不同學派顯得手足無措而「茫無可入」，於是轉而「隨世就辭章之學」，是為第二變；這個階段，也可按陽明的說法是「苦於衆說之紛擾疲越，茫無可入」。

年輕的陽明計劃從佛道二家那裏打通走向孔子之道路，於是就有「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構成其為學歷程之第三變。

以後的幾年裏，陽明的思想始終是徘徊不定的，「依違往返，且信且疑」，這當中自然包涵了與甘泉「丙寅定交」一段，第四變也就在其中了。

於是可以說，在龍場之前，陽明的為學歷程就已經有了四次變化。

以「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然有悟」的「龍場悟道」為最後一變，幾乎是所有人的共識。不過，陽明在這段自述中始終沒有提及「宋儒格物之學」，其後却有「獨于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於心」一語，這是耐人尋味的。

陽明的為學歷程（含龍場悟道一段）應劃分為六個階段即五次變化更為合乎實際，即在「既而從事宋儒循序格物之學，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若無所入」與「因求之老釋，出入久之，恍若有會於心」這兩個階段之間，實際存在着一個所謂「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的階段。陽明二十一歲到二十七歲，長達六年，成為其為學歷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階段。這個階段的兩端連結着兩個不同的